

我與古代中國哲學的不期而遇

方萬全*

我是英美分析哲學的研究者，但現在所要談的不是我的本行，而是以覺得有趣與感到幸運的雙重心情，簡單回顧多年來我與古代中國哲學的一些不經意的交會，並在最後提出我的一點感想。

記得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就讀學校的圖書館隨意地翻閱架上的書籍，結果無意間翻到了 A. H. Bloom 所著的一本心理語言學的著作。此書認為古代漢語——因此包括古代中國哲學——中欠缺與事實相反的條件句。因為我的語言哲學背景的關係，這樣的說法我一看就覺得很有問題，於是就寫了一篇論文，說明此書除了有問卷設計上的缺失之外，其對於古代漢語的語法與語意的看法也有問題。這個研究也開啟了往後我對於西方有關於中國古代語言與思想的一些比較「奇特」的看法的興趣。

陳漢生 (Chad Hansen) 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他有兩個深受矚目且具爭議性的觀點。其一是，他認為先秦哲學中的名詞都是物質名詞；他把這個看法稱之為「物質名詞假設」。從我對於語言哲學的瞭解來看，很自然地我會覺得這個看法很有問題。經過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看出，「物質名詞假設」不但會賦予古代漢語錯誤的語意學，還會使得原本在古代漢語中可以表達的思想，反而變得無法表達。陳漢生的另一個觀點則是認為先秦哲學中沒有真理概念。然而美國重要哲學家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 卻明白指出，真理概念是語言與思想的一個要件。這自然讓我對於陳漢生的觀點產生懷疑。其實陳漢生之所以會誤以為先秦哲學中沒有真理概念，是出於他對於漢語語句之為語句，以及某些類型的語句的邏輯 (或深層) 結構等有所誤解。

Herbert Fingarette 是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哲學系的退休教授，原以西方哲學的研究為主，但也寫了一本深受西方漢學界重視、關於《論語》的一本小書。此書中的兩個看法卻讓我深感訝異，因此成為了我近年來所關注的對象。其中

*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國科會 (現科技部) 哲學學門召集人

一個看法是，《論語》中無論聖人或一般人都沒有或不做選擇 (choice)；另一個看法則認為《論語》中只有恥感 (shame) 而沒有罪感 (guilt)。對付前一個說法的一個訣竅是去想像沒有或不做選擇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生活。其實這樣的生活會是一個隨機且完全地受個人的慾望、想法或所處的環境中的某些因素所牽引的生活；這樣的生活顯然與動物的生活無異，因此實在不可能是《論語》中的聖人或一般人的生活。至於 Fingarette 的第二個說法，因為我的研究才剛開始，所以還無法提出明確的批評。但可以想見的是，一個只有恥感而沒有罪感的生活，頂多只可能僅是個很膚淺的道德生活，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要把這樣的生活加諸於非常強調倫理道德生活的《論語》，不難想見是會有問題的。

我對於 Bloom、陳漢生與 Fingarette 等人看法的興趣，一方面在於這些看法對我而言都顯得十分「奇特」而難以置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分析哲學可以很方便地運用於這些看法的討論，進而看出其缺失。而這些看法的缺失所顯示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儘管語言可以有所不同，但有些基本成分如「真理」、「選擇」，「與事實相反」等概念，則是語言所不可或缺的。

近年來我正好也接觸了莊子的哲學。對於原本只對於西方哲學感興趣的我來說，這樣的發展也是自己所始料未及的。而且，我之所以會開始去較深入探討莊子的哲學，乃源自於我的行動哲學的研究，這個研究涉及了技藝現象的分析。我因此很自然地便想到是否可以把這方面的討論，運用於莊子的庖丁那種出神入化的解牛技藝的分析。在結合了西方所謂的道德知覺與道德心理學等等方面的資源之後，我發覺不但可以把庖丁解牛的故事及其要義說得更清楚，甚至連《莊子》中出現的例如「心齋」、「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定是非」，以及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等初看起來似乎很神秘而難解的說法，也可給予比較清晰的分析。這樣的分析除了可以相當程度褪去莊子哲學神秘難解的色彩之外，更可以讓《莊子》中許多可比擬於西方哲學的重要洞見，更清楚地顯現出來。

我很高興在我本行的研究之餘，還因為一些意料之外的因素，而有機會與古代中國哲學有上述的一些不期之遇。這樣的經驗雖屬片段，但也足以讓我深信西方哲學的資源，確實可以給予中國哲學研究帶來許多的助益。除了提供概念釐清的工具之外，西方哲學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對照，讓我們在處理中國哲學問題時能因而有更為敏銳的問題意識。對於有志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年輕學生，我的一個衷心的建議是，為了長久之計，還請趁年輕時多學習一點西方哲學。